

在二十世紀中蛻變的台灣

李筱峰 / 世新大學教授、台灣歷史學會理事、新世紀智庫論壇編輯顧問

與中國分隔上百年的台灣，有其獨特的條件與生存法則，她雖經歷過兩個外來的政權統治，卻仍充滿著活力與朝氣。回首過去，認識歷史，我們沒有理由在迎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失去信心與鬥志！

在迎接廿一世紀到來的此刻，心中百感交加。台灣在本世紀經歷了兩個外來政權的統治之後，終於在本世紀末，有了政黨輪替的機會。然而，這半年來，在舊勢力及其盤據的媒體的掣肘與圍攻之下，原本經濟基本面不該受影響的台灣，卻因信心基本面大受影響，造成股市大跌，又因國際經濟景氣下滑，台灣更難逃牽累。在經濟不景氣當中，統派媒體更加藉機天天恐嚇台灣人民說，我們將面臨「黑暗的時代」，非趕緊接受「一個中國」不可。

因此，面對新世紀的到來，許多人確實有前途茫茫之感，然而，回首廿世紀，狄更斯在《雙城記》中的一句話，卻在我耳邊響起——「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，也是一個光明的時代。」

回首廿世紀的台灣歷史，我們發現廿世紀是台灣蛻變的時代。台灣在十九世紀末葉結束了滿清異族的統治，換來另一個異族（日本）的統治。但是，新帝國主義的日本，比起舊帝國的滿清王朝，更具近代性格，這是台灣在不幸中的大幸。在進入廿世紀的前兩年，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起用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，開始有計畫地推動各項近代化建設。在跨入廿世紀的門

檻之前，台灣就開始幾項重要的基礎建設，例如——1899年，台北自來水道工事已經竣工；同年，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——台灣銀行，正式創立，奠定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；而縱貫鐵路工程，也在這一年開始動工。甫進入廿世紀之初，不僅代表衛生改善的下水道工程開始進行，後藤新平任內，更完成了土地、林野、戶口的調查；度量衡以及貨幣的統一；對於郵政、電信、航運、港灣、鐵路、公路等交通事業，也加緊建設或擴充。

長達四、五公里的縱貫鐵路於1908年4月全線通車；在大陸上的滿清政府尚未倒台，中華民國還未誕生的1911年，世界三大登山鐵道之一的阿里山登山鐵道也已經完工；產業方面，廿世紀的最初十年，六家新式的製糖會社也相繼成立，使製糖提升為近代化的工業生產；工業發展用的電力，也在廿世紀初開始開發，台灣首座水力發電所——台北深坑的龜山水力發電所於1903年開始興建，兩年後開始供電；台灣的財政，到了1904年以後，已經可以自力更生，無須再由日本本國中央補貼。

總之，進入廿世紀的台灣，開始脫胎換骨。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，產生結構性的改變。廿世紀的前半期，台灣已經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、司法機關、警察機構、戶政制度、農會系統、金融財經體系、大規模的農田水利、公路鐵路交通、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，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。

其中尤以基礎教育的普及，影響至大。拋開「帝國臣民」的意識形態不論，本世紀起才開始出現普及全島的現代新式教育，確實讓台灣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質變。1943年，台灣的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達71.3%（山地更高達86.4%），這個數字，中國在二十年後才勉強達到。除了識字率的提高之外，台人透過新式的現代教育，接受近代西方文明、基本科技，以及新的思想觀念，改變了舊有農業社會的體質，不僅過去農業社會以旬、朔望為生活作息的方式，開始改變成星期制的作息，過去承繼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陋習，如不衛生、不守時、不守信、無法治觀念等，也透過教育而有了相當的改善。因此，台灣社會逐漸從俗民社會（folk society）過渡到市民社會（civil society）。

雖然我們知道，日本在台的經營，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政策，但是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（亦即殖民地的剝削網路），必須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，因而打通了以往台灣因溪流切割、交通落後所造成的隔閡，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，助長了全島一體的台灣意識的萌芽。過去渡台開墾的移民，因來自不同原鄉，由於語言、風俗、習慣等差異，自然形成各籍分類聚居、依籍貫劃分

地盤的現象。又因台灣河川多東西走向，形成天然障礙，南北交通不便，許多地方的開發，皆依大陸對渡口岸為主，所以來台的漢移民及其後裔，仍抱持著原鄉祖籍的認同，難以形成台灣全島的意識。過去這些沒有台灣全島意識，卻分別帶著不同「原鄉認同」來到台灣的移民（及其後裔），由於生存競爭，進而衝突械鬥。在清代211年間發生過約六十次的械鬥。這種械鬥，到了廿世紀由於全島台灣意識的萌芽而消逝。

儘管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內有相當的建設，但其本質是剝削和壟斷的，除親日的台籍買辦之外，台灣人普遍受到歧視，因此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。日本領台期間的前二十年，發生過二十起以上的武裝反抗事件。1930年，山地的泰雅族更掀起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。不過，這些武裝抗日事件，大多為傳統式的農民暴動，或改朝換代的易姓革命，而不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。

直到1920年代，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，以及日本所謂「大正民主時期」民主主義風潮的影響，興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。1920年，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，成立「新民會」，拉開二〇年代各項社會運動的序幕。隨後有「六三法撤廢運動」、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的相繼發動；有代表台灣人民之喉舌的《台灣青年》、《台灣》、《台灣民報》、《台灣新民報》等刊物的相繼發行；1921年，蔣渭水結合青年學生及台灣各地社會領袖成立「台灣文化協會」，從事文化啟蒙運動，成為往後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、社會運動的大本營。1927年，「文協」分裂，左派掌控「新文協」，老幹部另組「台灣民

眾黨」。1930年台灣民眾黨又分出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；而農工運動團體方面，有「台灣農民組合」（1926.6）「台灣工友總聯盟」（1928.2）。1928年「台灣共產黨」在上海成立。此外，尚有許多小團體也在二〇年代出現，不一而足。概言之，1920年代的上半期，是台灣社運團體萌芽發展的時期，下半期則是各社運團體分道揚鑣、各行其是的階段。雖然團體甚多，立場不一，從右派的自治運動，到左翼的階級運動，但都代表著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各種心聲，包括自治的要求或獨立的願望。雖然不能完全如願以償，但起碼到了1935年，台灣總算有了選舉地方議員的機會。這是台灣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行使投票權，固然選舉與被選舉權限制很多，但對於當時大陸上正在國共內戰烽火中顛沛流離的中國人來說，應該是一項奢侈的經驗。

1937年以降，中日戰爭爆發，日本在台推動「皇民化」運動，試圖改造台灣人。1945年8月，大戰結束，也結束日本在台五十年統治。半世紀的日本統治，台灣人的文化和價值觀，以及台灣社會的近代化，都起了相當的變化。一般論者認為，此時的台灣與大陸的中國落差極大，台灣在各方面大約進步三十年。

二次戰後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，台灣人原以熱烈心情歡迎新政府，不意新來政權卻以征服者心態駕臨台灣，且官場貪污、牽親引戚、全面壟斷、經濟蕭條、物價暴漲、米糧短缺、失業激增、軍隊擾民、治安惡化，經過一年半的蹂躪，台灣社會倒退了三、四十年，終而爆發二二八事件，台灣社會精英被屠殺殆盡，民心潰決。這次「統一」，對台灣造成的傷害，

實在難以估計。但新的台灣意識再次凝聚，成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濫觴。

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流亡來台，在台灣建立學者所謂的「遷佔者政權」（Settler state）。雖然「中華民國在台灣」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，厲行「白色恐怖」統治，但台灣卻也一方面避開了共產中國的蹂躪，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，在台灣原有的海洋文化的歷史性格下，發展自己的經貿工商，成就了所謂「亞洲四小龍」之一的經濟成果，使得台灣在全球一九二個國家當中躍居為第十四左右的貿易大國。到了八十年代，高科技產業興起，台灣更成為電腦資訊的生產大國。

經濟工商的發展，必然帶動政治改革的要求，促進民主運動的發展。在長達三、四十年的「戡亂」體制與「戒嚴」統治之下，海內外有識之士奮起推動台灣的民主運動，五十年代有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的言論，及「中國民主黨」的組黨行動（1960）。七十年代有《大學》、《台灣政論》、《八十年代》、《美麗島》雜誌的衝擊，並以「黨外」透過選舉推動民主運動，歷經中壢事件（1977年底）、美麗島事件（1979年底），浴火重生，終於在1986年突破戒嚴禁令，成立「民主進步黨」，為台灣政治史邁入新里程。在民主運動的激盪之下，蔣家政權的威權統治終於在蔣經國晚年逐漸解體。

時序進入廿世紀的最後十年，台灣終於有了更上一層樓的民主轉型，不僅國會在九年代初得以全面改選，到了1996年也出現台灣史上的第一次民選總統。而各項自由人權的保障與落實，也普受世界的肯定。美國的人權組織「自由之家」

(Freedom House)發表 2000 到 2001 年世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，台灣被列為「自由國家」，與日本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等國並列同級。而對岸的中國則名列「不自由國家」的倒數第二名，與盧安達、喀麥隆等國同級。台灣與中國的落差，於此又見其一斑。

除了民主化的潮流之外，廿世紀的最後十年，台灣也逐漸掀起本土化與獨立建國的浪潮。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雖然早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久即展開，島內的獨立自救聲音，則在白色恐怖當中受盡箝抑。然而，隨著台灣國際外交處境的艱難、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威逼，民間的台灣獨立自救的聲浪，終於在進入九十年代之際逐漸明朗。1991 年的九八大遊行，提出加入聯合國的主張。「台灣」的國號以及憲法草案，也經由民間的制憲行動而提出。基於台灣主體性思維的台灣歷史文化的重新詮釋，也逐漸展露。

從歷史潮流的發展來看，台灣內部族群之間，理應逐漸形成台灣命運共同體，成為建構台灣的國民主義 (Nationalism) 的基礎。然而，在九十年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浪潮中，台灣內部仍有一群所謂「外省人」，似乎顯得惴惴不安。雖然有一群落地生根的新住民，突破眷村的藩籬，組成了「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」(1992)，但是所謂「外省人」當中，仍

有許多人拒絕「土斷」。這群過去「蔣家政權的依附族群」，在總統民選後，更難容忍本土化潮流，土生土長的李登輝總統，成為他們反對本土化潮流的標靶。尤其是廿世紀的最後一年，土生土長的民主進步黨人陳水扁當選總統，他們更極盡攻訐之能事。遺憾的是，也有一些世居台灣數代的人，也與他們互通聲氣，極力在自我破壞台灣的獨立自主的地位。當然，這是過去壟斷教育資源的國民黨在台灣實施「沒有台灣主體意識，只有大中國情結」的教育的總發酵。這股反台灣主體意識的舊勢力，與被列為「不自由國家」的中國，將發揮裡應外合的作用。我們很擔心，台灣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，這群過去「蔣家政權的依附族群」會變成「中共政權的前仗隊伍」。

回顧廿世紀這一百年，台灣與中國在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分隔的，其間只有四年的時間 (1945.10 - 1949 年底) 台灣是在中國的統轄下，而那四年當中，台灣不是受到二二八事件 (1947) 的腥風血雨的洗禮，便是受中國的內戰和經濟崩潰而被拖累。與中國分隔上百年的台灣，有其獨特的條件與生存法則，她雖經歷過兩個外來政權的統治，卻仍充滿著活力與朝氣。回首過去，認識歷史，我們沒有理由在迎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失去信心與鬥志！(本文原載於 2000 年 12 月 29 日自由時報)